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通论

许门友 主 编

傅 明 张 晖 刘瑞宁 副主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论

许门友 主 编
傅 明 张 晖 刘瑞宁 副主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准确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内容。特别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总体布局、外部环境、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进行了重点论述。本书可供高校、党校、干校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之用,也可供其他相关人员学习、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
论/许门友主编.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1124-064-1

I. 毛… II. 许… III. ①毛泽东思想—高等学校—研究
②邓小平理论—高等学校—研究 ③“三个代表”思想—
高等学校—教材 IV. A84 A849 D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9455 号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论

许门友 主 编

傅 明 张 晖 刘瑞宁 副主编

责任编辑 李文轶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100083) 发行部电话:010-82317024 传真:010-82328026

<http://www.buaapress.com.cn> E-mail: bhpess@263.net

涿州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6.5 字数:367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 000 册

ISBN 978-7-81124-064-1 定价:26.00 元

前 言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是我国获得独立与解放、建设与振兴的理论指南,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利于对我国社会发展规律、党的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也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书是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成果,编写中力求做到:

第一,内容科学、准确。本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主要内容、理论创新、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了全面准确的分析和论述,突出它们之间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党的重要文献为依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实事求是,从而保证了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第二,逻辑结构严密,系统性强。本书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重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重点突出。全书共分为十章:第一章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历史进程、理论形态和理论精髓,其脉络清晰,简洁明了;第二、三章分别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第四至十章,重点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每一章都融汇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思想精华和对相关问题的精辟论断。这样的逻辑结构,既有历史感和现实感,又能鲜明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第三,理论性与现实性紧密结合。本书在阐述各项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时,密切联系现实,紧密贴近实际。通过理论的分析,历史和现实的对照,正反两方面的比较,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总结,来引导和帮助人们,明辨重大政治是非和理论是非,从而增强了理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第四,时代特色鲜明。本书对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或列专章,或列专节,或融入到有关章节,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人的著作以及党的重要文献,同时吸收和借鉴了学术界和理论界的有关成果,在此谨致谢意。

本书编写人员如下:许门友(第一章第一、二、三节,第十章)、晁永红(第一章第四节)、何文兰(第二章,第五章第三节)、向英(第三章,第五章第一、二节)、张幸莲(第四章第一节)、傅明(第四章第二、三节)、张晖(第五章第四节,第九章)、刘瑞宁(第六章第一节)、李宏(第六章第二、三、四节)、安树彬(第七章第一、三节)、王有红(第七章第二节)、蔡蒙颖(第八章)。许门友负责全书的统稿、加工工作。由于学识、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2007年8月6日于西北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述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历史地位	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形态	9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基本经验	18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精髓	23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基本经验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31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	36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	52

第三章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征	59
第二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61
第三节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69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节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78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89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104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10
第二节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117
第三节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124
第四节 推动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135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 第一节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147
- 第二节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52
- 第三节 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 159
- 第四节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165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方针····· 172
- 第二节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180
- 第三节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188

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 第一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194
- 第二节 切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202

第九章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统一祖国的构想

- 第一节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209
- 第二节 “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 218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229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240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述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步伐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建党 80 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已经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指导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不断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和历史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20 世纪初，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潮中逐渐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它必然要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党的许多早期领袖和革命家，如李大钊、蔡和森、张闻天、邓中夏和恽代英等，都提出过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对其进行过探索。李大钊在 1919 年 8 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已经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 李大钊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领悟。在 1922 年出版的《先驱》创刊号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反对做“一定公式的奴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实际地运用它来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过程，从党成立起就已经开始了。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不是平坦的，更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主要是由于：要使产生于欧洲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适应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使这种典型的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革命理论，成为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基本群众、以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为基础条件的中国，这一过程必然是坎坷的。中国共产党人需要

^① 山东大学科社系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内部刊印），第 86 页，1980 年 5 月。

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毛泽东说过，“如果有人问，有哪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①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经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同这种错误倾向斗争的过程中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有更多的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仅有马克思主义还不够，只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是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杰出的代表。1929 年，在福建古田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如何纠正党和红军中存在的主观主义问题。他强调：要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全党同志要注重调查研究，党员要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查与研究，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1930 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围绕着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问题，作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 的重要论断。此时，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③ 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内逐渐形成共识。刘少奇在 1945 年 5 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明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他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毛泽东做出了最为杰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实现中国化？这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本身的内在要求，也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3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5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9 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35—336 页。

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更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实践的迫切要求，因此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反复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应用的教条。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必须结合具体情况，根据现存条件而对其加以阐明和发挥，并要随时随地以当时历史条件为转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具体的、多样的，不可能有一种固定的模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实现其“伟大的认识工具”的作用。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①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践提出的新任务和新问题。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既不同于欧美各国，也不同于俄国。因此，独立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迫切任务。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形成自己的理论形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内容。

第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 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的开始阶段，其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单纯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中国“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任务，为的是解决中国当前实际问题。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民族压迫，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80年间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但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传统意识、宗法意识的根深蒂固，加之没有民众的根基，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伴随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曾产生各种反映这些斗争并为之服务的思想理论。其中既有地主阶级开明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改良主义思想，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还有农民阶级提出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由于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落后，而且新兴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因而中国自身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可以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近80年中，中国人民没有什么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打了败仗，宣告其破产。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如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无力，抵挡不住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而败下阵来。一次次惨痛的失败和教训，使中国人民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又渴望、追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对其理论的需求也更加迫切。正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也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方面使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理论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许多先进人物，并促使其决心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开辟拯救中国的新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深切感受和痛恨，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感到振奋而有意义。中国一些先进分子认识到，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

当然，现实对理论的需求是一回事，理论能不能顺应现实的需要，很好地指导现实而为现实服务则又是一回事。在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如何能担当服务和指导中国现实的重任，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选择和接受？随着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和文化变革浪潮的不断高涨，传统封建旧文化的腐朽性日益暴露。但在“五四”运动以前，虽然先进分子引进的西学同封建文化进行了斗争，但打几个回合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在李大钊看来，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西洋文明也已经疲命于物质之下。瞿秋白认为“东方封建文化已不适应经济的发展而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则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巨魔，这两种文化都不可取”。于是，人们期待并呼唤着能克服这两种文化弊端又兼而有之的新文化，“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成为近代中国在社会与文化需求上的迫切主题。而这种新文化，既要能反映传统的文化根基，又要超越旧有传统意识、宗法意识的局限，拥有新的思想；既要符合中国传统的理想信念，又要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历史需求特征，救中国于时代的水深火热之中。马克思主义正是顺应历史潮流，通过对旧世界的科学批判与分析而掌握了中国的命运，以其巨大的影响力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力量，中国的先进分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李大钊称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成为组织群众运动的“宗教的权威”，他预言：“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① 陈独秀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新道德的化身，视为能凝聚人心，统一行为的伦理规范。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不同于中西固有文化的另一种新文化，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选择和接受。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传播并中国化，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

^①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①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特别是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革命理论的指导。同样，在新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也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某种契合点。任何外来文化要实现成功的移植，就必须从本土文化中找到其生长点和结合点。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并形成于欧洲工业文明的时代，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但它又是整个人类文明时代发展过程的产物，在它的体系中容纳了人类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某种相容性的一个前提条件；另外，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同一性，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决定了在一定的、可比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思想必然会超越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共同性。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属于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不同质的哲学，但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容或相通的方面。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和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但是，从服务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内在文化依据与中国传统理想的价值相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着相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两个方面。就“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言，就追求人格理想（人生理想）和马克思主义新人观而言都具有契合之处。传统文化中这些因素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通之处，尽管这些因素有空想、主观的成分，但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的深层理论契机。当然，也应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形成的，是古代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因此，它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较，属于一种不同质的文化，并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和特点。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容易使马克思主义出现“变形”和“失真”，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是我们今天重构文化所必须遵循的方法原则，也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须加以清理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总之，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化的形式，使之中国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和实践证明，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遵循两个途径：一是要把马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正确的批判和改造，使二者有机结合，更贴近中国的现实和民族的文化心理，成为民族精神的精髓和思维方式。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本民族的指导思想，并能够最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根本途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时，中国哲学界本土文化论十分流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主要在哲学领域展开，所谓“中国化”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和语言上的中国化。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问题的讨论逐渐超越纯粹哲学领域，形成了以艾思奇等学者为代表的文化论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践论两种观点。艾思奇、陈伯达和胡绳等人从文化学角度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现代化”的含义，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统一的观点。毛泽东则以一代政治大家的风范，探索以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道路，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国情的过程，同时也是在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正是从这样两个方面提出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国情，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和民族化。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要求我们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①“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②我们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绝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是要“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揭示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制订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毛泽东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①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中国具体实际的特点和特殊规律，形成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观念，只有这样，才能直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②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它具有世界性、开放性和广泛的适用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民族化的基本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过程中实现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实际相结合，通过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点、风格和形式来表现，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和国际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的理论，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意义和价值。因此，要使具有明显欧洲风格和欧洲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接受和掌握，并自觉地运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的民族形式转变为中华民族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转化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民所通俗易懂的理论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的有机统一。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必须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第一，要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重视理论。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忽视理论。毛泽东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③ 他反复强调，从整体上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还不高，同实践的要求相比较，我们党的理论水平还不能相适应。因此，尽快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④ 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只有系统的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才能很好地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第二，要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的国情有其特殊性，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国情，把握中国革命不同于别国革命的特殊性、特殊规律，把握其不同革命阶段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第三，要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需要进行理论创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际，要在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页。

的同时，不断创造新的理论。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地位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应用。“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①要真正做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际，而且要通过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②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和时代化，它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独创性经验，同时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概括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告诉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不是纯粹的理论学说，更不是让人生搬硬套的教条，而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指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斗争实践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同各国的斗争实践相结合，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决不能墨守成规、保守僵化。我们不能认为，一个只会背诵和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人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人，至多只是一个教条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因此，它必须在生动活泼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发展，用创新的理论去指导新的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不断发展着的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它既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是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在当代中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伟大智慧的结晶，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精神力量。特别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极大的挑战，更需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和凝聚力量。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 80 多年的奋斗历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同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根据中国具体情况也不行。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反之，一旦它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而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面貌便会为之一新，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便会兴旺发达起来。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走向了伟大的胜利，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到一个辉煌发展的新阶段。在新世纪新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正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实践证明，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和理论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与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即投入领导大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这时，我党对于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两个问题都有初步认识，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派出不少重要干部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但是党对于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了解，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还缺乏认识，对于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指导还缺乏独立自主权，因而没有能够抵御异常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对党的进攻。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同时选择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仿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城市武装暴动，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另一条是仿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边远的农村进行武装暴动，这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为代表，放弃进军长沙的原定计划，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道路。这两条道路都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探索。但是，哪一条道路适合中国国情？实践证明，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惟一正确的选择。因为当时尽管世界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领世界潮流，但中国仍属于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和交通极端落后，各地区发展又极不平衡，那种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利用危机时刻在反动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进行革命的理念，不符合中国国情。而领悟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真谛的毛泽东决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农村革

命根据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期的重要成果。

但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党内“左”倾错误领导不仅使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广大苏区几乎全部丧失，而且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又几乎使党和红军濒临绝境。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改组了中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逐渐有了深刻、完整的认识，并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中，取得了如下4个方面的重要的成果。

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这个思想虽早已有之，但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既要有实践的积累，又要有理论的准备。至抗日战争前期，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诞生，为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化”的基本内涵非常明确。此后，毛泽东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的科学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两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的第一块里程碑。

二是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要走相反的道路。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1939年，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并且深刻地论述了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基本经验，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思想。

三是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基础理论。但是，如何对党在20世纪上半叶领导的革命进行定位，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则不是这个理论所承担的任务，而需要外延更大、层面更高的理论来解决。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所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驾驭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